

# 辽上京“东向”格局考\*

## ——城市格局变化的权力因素考察

马郝楠

**摘要:**从辽上京开始修建到神册三年辽上京城市格局初步形成,辽上京呈现出强烈的东向格局特征,随着契丹政权形式上与性质上的逐步中原化,在上述东向城市格局的基础之上,辽上京的城市形态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综合文献与考古学材料,在辽上京城市形态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当中,其方位格局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变化。上述实例能够为城市史研究中城市形态同权力性因素的关联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辽上京 东向 南向 城市形态 权力因素

通过系统性的都城规划与营建,形成有序的城市形态与空间安排,并籍此强化其权威,乃是历代王朝之常见做法。对于影响中国古代王朝都城形制的权力性因素,学界已存在不少相关讨论<sup>①</sup>,常见的做法是从礼制的角度出发,以礼制同城市形态与城市空间安排中所显现的对应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一种“合法性”与“文化权利”视角下的合理阐释。然而而影响城市形态与空间安排的因素通常并非仅有礼制一种,因此,权力因素究竟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作用于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城市空间中,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鉴于相关问题较为复杂,本文谨以辽上京临潢府为例<sup>②</sup>,探讨辽上京城市形态历时性演变过程中的方位观念变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与权力因素的关系提出初步的看法。

### 一、从“前‘皇都’时代”到“‘皇都’时代”:辽上京东向格局之形成

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草甸,射金靛

\* 本文撰于2018年,曾提交2018年7月吉林大学、赤峰学院等共同举办的“第三届赤峰考古论坛”与2018年8月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首都师范大学第八届史学论坛”。

① 关于影响中国古代王朝都城形制因素的研究,可参见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等城市史方面的著作。近年来国内城市形态同权力因素关联性的研究主要有鲁西奇:《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张萍:《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两个维度》,《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等。

② 关于近年辽上京之研究,主要有王德忠:《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董新林:《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论述》,《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韩光辉、林玉军、王长松:《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陈章龙:《辽上京城“两城制”的探讨》,《辽金历史与考古》2009年;李冬楠:《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肖爱民:《辽上京的历史地位及其建筑所反映的诸社会现象》,《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任爱君:《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建筑群落的属性及其功能》,《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武田和哉:《契丹、辽都城的形制变化和特征》,《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sup>①</sup>可知辽上京之地本无城郭，所谓“辽右八部世没里地”<sup>②</sup>也。随后辽上京所在之地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化，一次为神册三年（918年），“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sup>③</sup>，辽上京以“皇都”之名作为完整的城市开始营建；另一次为天显十三年（会同元年，938年）<sup>④</sup>，在契丹获得燕云十六州后，“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sup>⑤</sup>，辽上京正式以“上京”之身份列于诸京之中。

上述两次重要的变化可将辽上京城市之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前‘皇都’时代”，辽上京其城尚未开始营建，契丹政权于此地零星筑有“明王楼”、“天雄寺”、“龙眉宫”等功能性建筑；第二阶段为“‘皇都’时代”，辽上京以“皇都”的身份开始建设并初步建成，此后这里成为契丹政权重要的政治中心；第三阶段为“‘上京’时代”，辽上京作为兼治华夏文明的重要政权诸京之一，在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之下，体现出城市格局的调适与变化。因而在上述时空理解的基础之上，结合契丹政权及辽上京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我们将分两个部分逐一探讨辽上京城市形态历时性演变过程中的方位观念变化现象。在本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前‘皇都’时代”到“‘皇都’时代”辽上京东向格局之形成，而在下一部分，将主要探讨“‘皇都’时代”到“‘上京’时代”过程中东向格局的逐步消解与调整。

### （一）文献记载所见“皇都”之建设

契丹本是漠北游牧之族，“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居”<sup>⑥</sup>，唐亡以后，契丹逐步展开扩张行动，其活动范围抵达燕、蓟、渤海等以定居为主要居住方式的地区，并常有军事冲突及劫掠。《辽史·地理志》载，“唐天复五年，太祖为迭烈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sup>⑦</sup>，《太祖本纪》又云，“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sup>⑧</sup>，为了安置这些劫掠而得的人口，契丹“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sup>⑨</sup>，“龙化州”即阿保机未称帝前契丹部族所建的城市。上述“劫掠-安置”过程即是契丹部族时期及契丹政权早期最为常见的一种建城模式，例如：

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指越王城），因建城。<sup>⑩</sup>

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sup>11</sup>

“劫掠-安置”模式同有辽一朝之“头下军州”制度亦有关联。<sup>12</sup>“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聚，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sup>13</sup>。头下军州制度自阿保机建国之初始，至天祚帝天庆五年“饶州渤

① 《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标点本，第496-497页。

②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0页。该条记载在“祖州天成军”下，关于何为“世没里”，杨军在《牧场与契丹人的政治》中有着比较详尽的讨论。（杨军：《牧场与契丹人的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在上述观点及后文关于“西楼”之讨论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述西楼之故，而辽上京亦属西楼，因此辽上京原为“辽右八部世没里地”。

③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12页。

④ 根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在辽太宗“诏以皇都为上京”前即改元会同。

⑤ 《辽史》卷4《太宗本纪》，第49页。

⑥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标点本，第2132页。

⑦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5页。

⑧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2页。

⑨ 同上。

⑩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1页。

11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标点本，第1002页。

12 关于头下军州制度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李锡厚：《头下与辽金“二税户”》，《文史》第3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3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6页。

海结构头下城以叛，有步骑三万馀，招之不下”<sup>①</sup>，贯穿辽政权始终。可见，“劫掠-安置”模式为契丹部族及契丹政权建设城市的一条重要线索，而辽上京的最初建设，又是否与“劫掠-安置”模式相关呢？相关史料能够提供一定的线索：

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之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sup>②</sup>

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韦甸，射金镞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sup>③</sup>

上述史料中有两点比较重要的信息。首先，辽上京临潢府之选址乃是辽太祖阿保机“射金镞箭以识”，这也就意味着，按照上述文献的说法，辽上京所在的位置从一开始便计划修建重要的建筑，即所谓的“金镞一箭，二百年之基”<sup>④</sup>。其次，辽上京在系统性地建设“皇都”之前已兴建有城郭宫室，并且名叫“西楼邑”。

辽代相关史料中常见有“四楼”的说法。《资治通鉴》引《虏庭杂记》曾经提到，“契丹阿保机于所居大部落置楼，谓之西楼，今谓之上京；又于其南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又于其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又于其北三百里置楼，谓之北楼”<sup>⑤</sup>；《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仁宗《实录》又云，“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sup>⑥</sup>，指出了四楼的具体位置。由于相关史料记载晦暗不明，加之不同记载间颇有冲突，目前学界关于“四楼”的性质存在着数种不同的解释。王树民、任爱君、陈晓伟等认为，“四楼”乃是分别位于四个不同地点的楼阁式建筑，或是类似中原王朝“丹墀陛阶”的一种专供可汗享用的毡殿，上述观点可被称作“四楼建筑说”<sup>⑦</sup>；杨军等则学者认为，“四楼”可能与辽代的制度有关，并同其后的斡鲁朵制度与四时捺钵制度一脉相承，上述观点可被称作“四楼制度说”。<sup>⑧</sup>

解决“四楼”问题的关键是对“楼”的涵义进行准确恰当地阐释。就持“四楼建筑说”观点学者常举史料来看，例如《武经总要》记载，“至阿保机私立年号，称大辽国，建所居部落为西楼，有楼数间而已。后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邑屋皆东向，如军帐之法”<sup>⑨</sup>。《武经总要》后出于《旧五代史》，而“后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邑屋皆东向，如军帐之法”全抄自《旧五代史》，<sup>⑩</sup>仅改“车”为“军”字而已，且二字形近，似为讹误。此外这里提到“有楼数间而已”是否就意味着“西楼”乃是楼阁式建筑呢？《武经总要》又云，“阿保机既创西楼，又于西南筑一城以贮汉人，今名祖州”<sup>11</sup>，这里文献已经交代的很明白了：西楼既为阿保机所“创”，又何来建筑一说呢，上面所说的“有楼数间”，也更像是说明“西楼”那时的聚落形态，而非对“西楼”一词内涵的补充性描述。

《辽史》对于“四楼”的表述则更加清楚。《辽史·地理志》：“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

① 《辽史》卷110《萧陶苏斡列传》，第1580页。

②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第2132页。杨军认为，该句中“邑”字应断至下句，参见杨军：《契丹“四楼”别议》，《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6-497页。

④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8页。

⑤ 《资治通鉴》卷269引《虏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标点本，第8929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引《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561页。

⑦ 参见王树民：《略论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文史》第1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任爱君：《契丹四楼源流说》，《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⑧ 参见杨军：《契丹“四楼”别议》，《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⑨ 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22《上京四面诸州·上京》，《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1113-1114页。

⑩ 参见《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第2132页。

11 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22《上京四面诸州·上京》，《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第1116页。

西楼”<sup>①</sup>，此处用“置”，犹如文献中常见之“置某州”者。《辽史·太祖本纪》：“是岁，以兵讨两治，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威威”<sup>②</sup>，此处以寺建于西楼，其“西楼”当指空间范围。与此相对的是，南方汉人通常径称辽上京为“西楼”。《胡峤陷虏记》：“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sup>③</sup>；《程史》：“（上京）乃契丹所谓西楼者”<sup>④</sup>。案：《辽史》虽“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然而其本自辽人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及金人萧永祺、陈大任等人所修之《辽史》，可信度较高；《胡峤陷虏记》乃为胡峤亲手所著，其理解或有所偏差，然而胡峤既说“所谓西楼也”，估计是他曾听到将上京称为“西楼”的叫法。因此“四楼建筑说”若想成立，则必须给予上述史料以合理的解释，或者直接否认上述全部史料，这是相当有难度的，因此目前来看，“四楼建筑说”仍旧缺乏坚实的证据。另外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四楼”似乎同辽初的某种行政区划制度相关，或者可能为阿保机所置的某种地理区域概念（类似于关树东等学者对于五京道的理解）<sup>⑤</sup>，这里我们不对“四楼”作为行政区划制度或是地理区域概念的具体内容进行蠡测，仅就同“四楼”相关的史料而言，首先，《辽史·地理志》“祖州天成军”条：“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sup>⑥</sup>，可知祖州与辽上京所在之地均属“西楼”<sup>⑦</sup>；其次，“西楼非楼”，辽上京城市正式开始营建以前，并没有独立的称作“西楼”的建筑存在；再次，辽上京于正式营建之前“有楼数间”，已经存在数个可能为楼阁式建筑的建筑物。

《辽史》所载神册三年（918年）前可能为辽上京所在地的已经存在的建筑物如下：

1. 明王楼。辽太祖二年（908年），“建明王楼”<sup>⑧</sup>，辽太祖七年（913年），耶律刺葛叛乱，“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sup>⑨</sup>，明王楼遭到焚毁。由后文“冬十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sup>⑩</sup>；“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sup>⑪</sup>可知，明王楼确实位于辽上京所在地中，确切的位置在后来所建的开皇殿处。

2. 天雄寺。辽太祖六年（912年），“是岁，以兵讨两治，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sup>⑫</sup>，由后文“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sup>⑬</sup>可知，天雄寺也确实位于辽上京所在地内。董新林等认为，“皇城南部有不规整的街道及官署、府第、作坊和寺院基址，其中一座寺院内残存一尊残高4.2米的石刻菩萨像，为天雄寺遗址。”<sup>⑭</sup>

3. 龙眉宫。“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草甸，射金靛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sup>⑮</sup>，又“秋八月己卯，幸龙眉宫，轶逆党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赐有功将校，所掠珍宝、

①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0页。

②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6页。

③ 胡峤：《胡峤陷虏记》，《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④ 岳珂：《程史》卷5《赵良嗣随军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

⑤ 参见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傅林祥：《辽朝州县制度新探》，《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⑥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0页。

⑦ 与此类似的是，《辽史·地理志》记载降圣州“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至于此”（《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5页），又记龙化州“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于此建东楼”（《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5页），若记载正确，则可知降圣、龙化二州均属东楼。上述材料亦可佐证上文““四楼”似乎同辽初的某种行政区划制度相关，或者可能为阿保机所置的某种地理区域概念”之观点。

⑧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4页。

⑨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7页。

⑩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10页。

⑪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⑫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6页。

⑬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8页。

⑭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内蒙古辽上京遗址探微》，《中国文化报》2013年6月7日，第4版。

⑮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6-497页。

孳畜还主”<sup>①</sup>，因此“龙眉宫”可能为辽上京所在地的一座建筑。<sup>②</sup>目前尚不清楚其始筑时间，亦不详其何时废弃。

4. 开皇殿。辽太祖八年（914年），“冬十二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sup>③</sup>，又“天显元年（926年），平渤海归，乃展郭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sup>④</sup>。这两条史料相互矛盾，笔者认为，根据《辽史·地理志》的文法，此处之“起三大殿”乃是约略之说，实际上三大殿的始筑时间可能有所不同。若太祖八年建开皇殿的记载正确，那么开皇殿在神册三年正式开始兴建“皇都”前便至少已经开工。

因此，尽管史料有载：“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sup>⑤</sup>，听起来像是“罗马一日建成”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在神册三年“城皇都”之前，辽上京城市的营建工作便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明王楼、天雄寺、龙眉宫与开皇殿，均是先于正式开始兴建“皇都”前的首批建设项目。“神册元年（916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台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sup>⑥</sup>，在上京城尚在建设的过程中，阿保机先于龙化州“上尊号”，其后于神册三年（918年），契丹政权正式决定宣布“城皇都”，“梁遣使来聘。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贺”<sup>⑦</sup>，可见对于契丹政权甚至是附近各国来说，“皇都”的正式兴建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

契丹政权于明王楼、天雄寺、龙眉宫与开皇殿建设后才决定正式开始兴建“皇都”，自然存在其深层次的考量，在没有相关记载的情况下，我们不去多加揣测，在这里仅讨论由于上述兴建逻辑而产生的一个后果，即在契丹政权尚未完成汉化，甚至连契丹政权都尚未成形，其生活习惯尚以“素无邑居”为主之时，其所兴建的建筑必然在更大程度上烙有民族文化及其知识体系的痕迹，并且在“皇都”正式开始兴建之后，尽管阿保机仿照华夏礼制“称帝”、“上尊号”，甚至“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sup>⑧</sup>，然而受到先期所建建筑的影响，加之可能存在的契丹民族的文化惯性，“皇都”的总体城市形态与空间安排并不能完全消除旧有因素的影响。其东向格局正是一个较为显著的例子。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皇都）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sup>⑨</sup>，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辽史·百官志》中的“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撵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sup>⑩</sup>。契丹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曰祭东”<sup>⑪</sup>，从中可窥见契丹人有着同华夏礼制不同的方位观念，尽管这样的方位观念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社会成员个体所处的知识环境而存在着不同，然而通过上述文献记载的梳理与考证，总的来看，不难发现上述方位观念在“皇都”的建设过程中体现在城市空间与城市形态安排上，并对辽上京的形制、布局及下一步的营建修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考古材料所见“皇都”之面貌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外，近年来涌现的一批考古学材料也为探讨从“前‘皇都’时代”到“‘皇都’时代”辽上京东向格局之形成提供了帮助。从目前可以见到的考古学材料来看，

①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8页。

② 由“谓之龙眉宫”看，“龙眉宫”亦有可能只是地名而已。

③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10页。

④ 《辽史》卷74《康默记传》，第1356页。

⑤ 同上。

⑥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10-11页。

⑦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12页。

⑧ 《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13页。

⑨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第2132页。

⑩ 《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800页。

⑪ 《辽史》卷116《国语解》，第1698页。

赤峰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经过系统发掘的辽代遗迹自外至内有：皇城城墙的西门<sup>①</sup>、东门<sup>②</sup>及其瓮城；皇城城内的“皇城一号街道”<sup>③</sup>（即皇城南门内大街）及皇城东门内大街<sup>④</sup>；宫城城墙的西门<sup>⑤</sup>、东门<sup>⑥</sup>及南门<sup>⑦</sup>；宫城内的“一号殿址”<sup>⑧</sup>和“二号院南廊庑”<sup>⑨</sup>以及靠近皇城西城墙的“西山坡佛寺遗址”<sup>⑩</sup>。其中多数遗迹经历过多次修缮与营建，结合不同时期遗迹所呈现的地层层位关系以及相关的史料记载，大体能够推断出从“前‘皇都’时代”到“‘皇都’时代”辽上京东向格局形成时期的相关遗迹，兹梳理如下：

1. 皇城西门、东门及其瓮城。《辽史·太祖本纪》：“癸亥，城皇都”<sup>11</sup>；《地理志》：“乃展郭郭，建宫室”<sup>12</sup>。城墙是后期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城皇都”与“展郭郭”亦有修筑城墙之意<sup>13</sup>，因此依照中国古代王朝都城修筑的常规逻辑来讲，“‘皇都’时代”皇城城墙、皇城西门、东门及其瓮城可能已经存在。文献记载汉城之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sup>14</sup>，可知皇城西门应名为乾德门，东门应名为安东门。

皇城西门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城墙中部，共经历三次较大规模的营建与修葺过程，其中首次营建的时间应属辽代初期，与“皇都”大规模展开营建的时间较为吻合。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首次营建时的皇城西门遗址共分为城门与瓮城两个部分，其中城门为单门道，门基宽约 6.2 米，进深 20 余米，南北墩台发现条石块包墙与外抹白灰面痕迹；瓮城部分平面呈马蹄形，亦仅有一南向门道，宽约 5.84 米，南北进深约为 8 米。董新林曾提到“根据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推测，城门之上应有城楼建筑”，但发掘简报中并未提及倒塌砖瓦堆积出于何地层。<sup>15</sup>

皇城东门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东城墙中部，同皇城西门遥遥相对。目前尚未公布皇城东门遗址发掘的详细资料，从相关的报道来看，皇城东门在首次营建时亦分为城门与瓮城两部分，其中城门部分呈一门三道格局，门道内残存石地袱、木地袱承排叉柱的建筑结构基础，并且在倒塌堆积内发现了大量的砖木构件，因此可能存在城楼建筑。若上述城楼建筑在皇城东门首次营建时同时营建，则能合“有楼橹”之记载。根据勘探，瓮城部分有一南向门道，

①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等：《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 年 1 月 20 日，第 8 版。

②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 年 5 月 6 日，第 8 版。

③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2013 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 年 2 月 14 日，第 8 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 年第 1 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左利军、肖淮雁、李春雷：《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 年 1 月 30 日，第 8 版。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第 6 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 年第 1 期。

⑧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 年 5 月 6 日，第 8 版。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 年第 1 期。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 年第 1 期。

11 《辽史》卷 1《太祖本纪》，第 12 页。

12 《辽史》卷 37《地理志一》，第 498 页。

13 “郭郭”常指外城，亦泛指城郭。

14 《辽史》卷 37《地理志一》，第 499 页。

15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等：《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 年 1 月 20 日，第 8 版。

具体状况有待进一步发掘。<sup>①</sup>

2. “皇城一号街道”及皇城东门内大街。上述二街始建年代缺乏文字记载,不过按照常理来说,通常在兴建城门时即同时修建穿过城门的大道,因此推测上述二街于“‘皇都’时代”业已存在。

“皇城一号街道”遗迹为南北向,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北接宫城南门,向南可能通向皇城南门,根据层位关系及遗迹与遗物的变化,可将“皇城一号街道”自营建起从早至晚分为五段。第一段为辽初遗迹,其时代大体与“‘皇都’时代”相仿,街道宽度约为17-18米,路面中部高于两侧,其下即为生土层;路西侧发现同时期建筑F30,亦建于生土之上,“坐西朝东,开放式面向街道”。史书记载“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sup>②</sup>,但相关报道有“在各阶段的街道和房址中,均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一部分是有切割、磨制等加工痕迹的骨料”的说法,因此“皇城一号街道”路旁临街建筑的性质仍需要进一步讨论。<sup>③</sup>

皇城东门内大街为东西向、联通皇城东门与宫城东门的道路。根据试掘的情况来看,皇城东门内大街应至少经过三次营建,最早一层路面直接建于生土之上,路面残宽43.5米,其南部有一条浅路沟。根据出土遗物及层位关系,发掘简报认为其始建与宫城东门大体同时。<sup>④</sup>

3. 宫城西门、东门及南门遗址。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sup>⑤</sup>记载可知,宫城南门应名为“承天门”,西门应名为“西华门”,东门应名为“东华门”,又由“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sup>⑥</sup>,若该条史料记载准确,则可知两点:首先,“‘皇都’时代”即存在宫城城墙,因此按理来讲“‘皇都’时代”宫城应至少存一门以供出入;其次,南门即“承天门”为“‘上京’时代”所辟,因此“‘皇都’时代”宫城疑无南门。此外从目前公开的考古学材料来看,尚不能断定宫城西门于“‘皇都’时代”是否已经存在。

宫城西门遗址与皇城西门相对,据勘探可知两门间有路相连。相关报道认为该门址在辽代至少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营建,但不清楚其具体营建状况。从整体的发掘结果来看,宫城西门遗址由两侧的墩台和中间的单门道两部分组成,门道宽度约为6.4米。关于其具体始建时代,还需要等待相关发掘报告的发表。<sup>⑦</sup>

宫城东门遗址亦与皇城东门相对,其兴建前,首先在宫城东墙夯筑时预留宽度为22米缺口,再在缺口上夯筑宫城东门并修建相关设施,根据上述现象能够判断,若无意外情况,宫城东门应与宫城城墙几乎同时修建,结合“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可看出,宫城东门应于“‘皇都’时代”即已存在。根据发掘简报,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殿堂式的城门,始建于生土层之上,南北面阔31.2米,东西进深13.1米,有较为清楚的柱网结构城门建筑遗迹。发掘简报认为“宫城东门的始建年代应在神册三年(918年)至天显元年(926年)间,是说可从。”<sup>⑧</sup>

①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8版。

②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③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2013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14日,第8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年第1期。

⑤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⑥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左利军、肖淮雁、李春雷:《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30日,第8版。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4. “一号殿址”及“二号院南廊庑”遗址。《辽史·地理志》：“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郭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sup>①</sup>，《薛映记》：“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sup>②</sup>，加上上文中所提到的“龙眉宫”与“开皇殿”，可知辽上京或有开皇殿、安德殿、五鸾殿、昭德殿、宣政殿、开皇殿与龙眉宫等殿堂式建筑。但由于记载不明，加之同“一号殿址”及“二号院南廊庑”发掘相关的报道信息量有限，因此尚无法将上述遗址同文献记载相对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亦无法断定其始建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遗址均为东向院落式建筑。<sup>③</sup>

5. “西山坡佛寺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内西南的自然高地上，经正式考古发掘的北组三座圆台型建筑基址均为东向。“西山坡佛寺遗址”同“一号殿址”及“二号院南廊庑”遗址类似，始建时间尚不可考。<sup>④</sup>

综合上述考古学材料，“‘皇都’时代”遗迹多始建于生土之上，“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草甸”<sup>⑤</sup>之记载应当可信；“‘皇都’时代”辽上京的皇城东门、皇城东门内大街及宫城东门规模与形制均大于同类建筑，例如皇城东门内大街宽度至少在 43.5 米以上，而“皇城一号街道”宽仅 17-18 米，因此就城郭遗迹所呈现的格局来看，“‘皇都’时代”辽上京的东向格局确已形成；“一号殿址”、“二号院南廊庑”及“西山坡佛寺遗址”还不能确定其始建时间，但整体朝向上仍旧偏东，同东向格局的城郭相同，若今后能够证明这些建筑在“‘皇都’时代”已经存在，则更能为上述判断增添强有力的证据。

从“前‘皇都’时代”至“‘皇都’时代”辽上京之发展可总结如下：至少于辽太祖二年（908 年），即辽太祖称帝后的第二年，契丹政权已经有了在辽上京所在地建都的设想。随后的十年里，尽管辽上京的建筑工程曾受到刺葛之乱的影响，天雄寺、开皇殿等建筑仍旧循序渐进地开始修建。神册三年（918 年），“皇都”正式展开兴建，其皇城与宫城可能于此时开始修建，朝向为东，至此，辽上京的东向格局正式形成。

## 二、从“‘皇都’时代”到“‘上京’时代”：辽上京格局的新变化

进入“‘皇都’时代”后，契丹政权迅速扩张，并逐渐走向成熟。天显元年（926 年）“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sup>⑥</sup>，契丹政权实质性控制了渤海政权；会同元年（938 年），“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妣、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sup>⑦</sup>，据有燕云十六州的契丹国，其政权性质与统治手段逐渐变化；大同元年（947 年），耶律德光“亲征晋国，重贵面缚”<sup>⑧</sup>，“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sup>⑨</sup>，契丹政权进一步融入中原文明之话语体系；统和二十二年（1005 年），“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sup>⑩</sup>，至此辽国的劫掠战争大体停止，其政权的运作方式、权力结构与形式特征逐步定型<sup>11</sup>，辽国成为“东

① 《辽史》卷 37《地理志一》，第 498 页。

② 《辽史》卷 37《地理志一》引《薛映记》，第 500 页。

③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准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 年 5 月 6 日第 8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 年第 1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 年第 1 期。

⑤ 《辽史》卷 37《地理志一》，第 496-497 页。

⑥ 《辽史》卷 2《太祖本纪》，第 24 页。

⑦ 《辽史》卷 4《太宗本纪》，第 49 页。

⑧ 《辽史》卷 4《太宗本纪》，第 65 页。

⑨ 《辽史》卷 4《太宗本纪》，第 64 页。

⑩ 《辽史》卷 14《圣宗本纪》，第 175 页。

11 可参见漆侠：《从对〈辽史〉列传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sup>①</sup>的大国。

在上述背景之下，会同元年“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sup>②</sup>，“皇都”正式成为辽之“上京”；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建中京”<sup>③</sup>；重熙十三年（1044年）大同军节度“升为西京，府曰大同”<sup>④</sup>，“于是五京备焉”<sup>⑤</sup>。“五都错峙，帝宅尊乎中上，则大定之分甲天下”<sup>⑥</sup>，在权力因素影响下，辽人的空间观念与地理认知均有所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辽国形成了以五京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地理格局；而从城市空间层位的微观角度来看，以辽上京为例，从“‘皇都’时代”至“‘上京’时代”，辽上京的东向城市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试将辽上京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分梳如下：

1. “承天门”之开辟。据上文所论，“‘皇都’时代”宫城疑无南门，“皇都”改“上京”时，“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sup>⑦</sup>，此条材料有两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首先是“承天门”其名。《辽史·地理志》：“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sup>⑧</sup>。北宋东京宫城东门即谓“东华门”，西门谓“西华门”<sup>⑨</sup>，南宋“东苑门曰东华”<sup>⑩</sup>，明代南京宫城“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sup>⑪</sup>，北京紫禁城“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sup>⑫</sup>，亦有东华门、西华门与承天门，其中承天门于清代改名为天安门。上述宫城中，“东华门”与“西华门”均为宫城东西两侧偏门，而承天门为宫城南侧之正门。因此按照上述命名逻辑，辽人可能将名为“承天门”的宫城南门视作正门。

其次，“承天门”为太宗依汉制因礼而辟。南向观念是“汉制”的重要内涵，因此在上述需求下新辟宫城南门不无道理。《辽史》载：

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离董就馆赐晋使冯道以下宴。丙午，上御开皇殿，召见晋使。壬子，皇太后御开皇殿，冯道、韦勋册上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

……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丁未，御开皇殿，宴晋使冯道以下，赐物有差。<sup>⑬</sup>

契丹受燕云十六州时，开皇殿确实作为重要的礼仪场所，“召见晋使”、“册上尊号”并举行宴会。在辽上京宫城南门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亦见到仪式性活动所存留的遗迹。宫城南门门道中央有一打破始建路面的动物埋藏坑，坑内发现两副基本完整的狗骨架和两个羊头骨，其位置经刻意摆放，两犬以侧卧的姿势将羊头骨包围在中间。<sup>⑭</sup>就目前经过发掘的皇城西门、

①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6页。

② 《辽史》卷4《太宗本纪》，第49页。

③ 《辽史》卷14《圣宗本纪》，第177页。

④ 《辽史》卷19《兴宗本纪》，第264页。

⑤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6页。

⑥ 《创建静安寺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⑦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⑧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⑨ 参见《宋史》卷85《地理志一》，第2097页。

⑩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258页。

⑪ 《明史》卷68《舆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7页。案：《明史·地理志》中的记载同此处不同，为：“……亦曰紫禁城，门六：正南曰午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宫城之外门六：正南曰洪武，东曰长安左，西曰长安右，东之北曰东华，西之北曰西华，北曰玄武。”，叶晓军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考证，参见叶晓军：《南京宫城门名考辨》，《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⑫ 叶晓军：《南京宫城门名考辨》引《明实录·太宗实录》，《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⑬ 《辽史》卷4《太宗本纪》，第48-49页。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东门,以及宫城西门、东门来看,尚未见到类似遗迹,说明宫城南门具有特殊性。因此,承天门的开辟可能意味着“‘上京’时代”城市格局的变动。

2. 宫城诸门之修缮。修缮状况之不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宫城不同城门在始建后重要性与地位的变化,从考古材料看,宫城的南门与西门均经过多次修缮或营建,而宫城的东门自始建后仅在局部有所修补。

宫城南门在辽代经历了三次营建,第一次应即会同元年(938年)“辟承天门受礼”。先是在宫城南墙上设一豁口(亦可能在修筑宫城南墙时便已预留),再修建夯土墩台、门楼与登临墩台门楼用的马道,墩台与马道外壁抹黄泥。第二次营建对夯土墩台进行了削减调整,并在墩台外改抹白灰皮。第三次营建除了调整夯土墩台外,还对墩台及马道进行了包砖处理。宫城南门的数次修缮均未改变其形制与大小,自始建至被毁,宫城南门始终仅有一个门道。

①

宫城西门在辽代经历了两次营建,其首次营建时间不详,报道亦未提及其在第二次营建后同第一次营建相比有何变化。②

宫城东门在“‘皇都’时代”首次营建后,仅在台基中部及北部进行过修补,其中台基中部的补夯痕迹超出了东门台基的夯土范围,推测是对路面进行的修补。由于遗迹破坏严重,始建地面大多被晚期灰坑、灰沟破坏,因此并不清楚其始建时的门道数目。董新林曾在相关报道中推测,由于皇城东门为三门道格局,加之由柱网结构遗迹推测门楼为面阔间、进深两间的平面布置,因此宫城东门可能亦为三门道布局。③

尽管从建筑形制上讲,疑为三门道布局的宫城东门在宫城三门中最为特殊,但宫城南门不但经过的修补次数最多,亦在辽代中后期进行了包砖处理,结合辽代中后期五京制的确立,辽上京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减弱,如中京即设“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以待新罗使,来宾馆以待夏使”④,宫城南门未改筑为三门道布局亦属合理。

3. 宫城宫殿朝向之变化。目前发现一座重要宫殿基址存在朝向变化现象,该建筑遗址被称为“1号建筑基址”,位于宫城最西端的自然高地上,始建时为东向建筑,同宫城东门与皇城东门处于同一条轴线上。在辽代第二次营建的过程中,该建筑的朝向被改为南向。⑤由于尚未有发掘报告发表,且亦无文献记载能够对应,因此暂不清楚该建筑改建的具体细节。

4. “汉城”之修筑。《辽史·地理志》:“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郭郭,建宫室,名以天赞”⑥。《说文解字注》:“郭、恢郭也。城外大郭也”,若此处“展郭郭”记载有修建汉城之意,则说明汉城最早于天显元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辽史·地理志》又载,“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⑦,“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⑧。《薛映记》:“子城东门曰顺阳”⑨,同《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相冲突,因此上述城门名称的记载不一定可靠,不过从当前辽上京遗址地表显现的遗迹来看,辽上京皇城南部确实存在子城,该子城修筑于皇城南部,可能也存在着南向布局的考虑。

---

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年第1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2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④ 《辽史》卷39《地理志三》,第546页。

⑤ 邱静、王义晶:《契丹皇都“辽上京”遗址考古有重大发现》,《赤峰日报》2017年11月4日,第1版。

⑥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8页。

⑦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⑧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99页。

⑨ 《辽史》卷37《地理志一》引《薛映记》,第500页。

此外,辽中京的城市空间格局亦可以作为参考。辽中京是辽政权在“澶渊之盟”后所建设的都城。《契丹图志》:“奚地居上、东、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旷,西临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东西八百里,连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号曰中京”<sup>①</sup>;《辽史·地理志》:“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郭郭楼阁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郭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民”<sup>②</sup>;《王说墓志》:“建彼皇都,营筑劳神,板图任重,加授户部使,掌户籍,辖民夫。大内既成,宏基已就。功名未显,疾病俄萦”<sup>③</sup>。根据上述材料,首先,辽中京所在之地本为“奚地”,所谓“七节度金山河川地”也,在辽上京城始筑前并无聚落,此同辽上京当年的情况类似;其次,辽中京亦有“皇都”之称,同辽上京有着相似的政治地位;再次,辽中京的城市形态“拟神都之制”,从史料来看,辽、宋诸京均无“神都”之叫法,尽管唐代曾短暂将东都更名为“神都”<sup>④</sup>,但从相关记载来看,《辽史·地理志》中所说的“神都”指的应当并不是唐东都洛阳,而是指“南望云气”所看到的“郭郭楼阁之状”。那么“拟神都之制”所建的辽中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辽史·地理志》引《上契丹事》记载:

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圆才四里许。门但重屋,无筑阁之制。南门曰朱厦,门内通步廊,多坊门。又有市楼四:曰天方、大衢、通闾、望阙。次至大同馆。其门正北曰阳德、闾闾。城内西南隅冈上有寺。城南有园圃,宴射之所。<sup>⑤</sup>  
路振《乘轺录》:

外城高丈余,步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厦门,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厦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坐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

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门曰阳德门,凡三间,有楼阁。城高三丈,有睥睨,幅员约七里。自阳德门入,一里而至内门,内闾闾门,凡三门,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闾闾门楼有五凤,状如京师,大约制度卑陋。东西掖门去闾闾门各三百余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sup>⑥</sup>

1959年至1960年,辽中京发掘委员会曾组织对辽中京进行勘探与发掘<sup>⑦</sup>,结合上述材料,我们认为辽中京在城市形态与空间安排上呈现以下特点:首先,辽中京自外之内分为外城、内城(第二重城)与皇城。外城位于内城南侧,为规整的长方形形态,其同内城的方位关系与辽上京汉城同皇城的方位关系颇为类似,其北墙即内城之南墙。内城亦为规整的长方形形态,其居中偏北的位置坐落有辽中京的皇城,为近乎规整的正方形,其北墙即内城之北墙。外城、内城与皇城共同以朱厦门、阳德门、闾闾门为轴线,呈现坐北朝南的格局,其轴线所在的位置有大道相通,宽度达到64米,应为辽中京最重要的干道。

综合上述材料,“‘皇都’时代”至“‘上京’时代”辽上京格局所出现的变化如下:在“‘皇都’时代”所形成的东向城市格局的基础之上,在部分建筑及区域上呈现出对东向格局的消解与破坏,承天门的开辟、宫城城门的不断修缮、宫殿朝向的变化与汉城的修筑使南向格局不断显现。位于这一时期所兴建的辽中京亦能作为这一变化过程中有价值的参考,其显著的南向格局与都城规制反映了此时辽人在认知与认同上同“‘皇都’时代”的差异,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新变化同权力因素之间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辽上京城市格局出现的上述新变化并不意味着其东向格局的根本性改变。“‘皇都’时代”其城郭、宫室与主要建筑便已悉数落成,其时所形成的东向格局伴随建

① 叶隆礼:《契丹图志》引《契丹图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1页。

② 《辽史》卷39《地理志三》,第545-546页。

③ 《王说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

④ 《旧唐书》:“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旧唐书》卷6《则天后本纪》,第117页。)

⑤ 《辽史》卷39《地理志三》引《上契丹事》,第549页。

⑥ 路振:《乘轺录》,《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24页。

⑦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第9期。

筑的沿用可能延续至辽末。除了上文中所提到的皇城、宫城东门一直沿用的三门道格局以外,辽上京的很多建筑仍旧保持东向的形态,如薛映于上京所见,“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sup>①</sup>。考古勘探亦发现了更多沿用至辽末的东向格局建筑。<sup>②</sup>“‘上京’时代”所出现的南向格局建筑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辽上京的城市格局,仍需进一步进行探讨。

### 三、小结与余论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在辽上京城市形态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当中,其方位格局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变化。从辽上京预谋修建到神册三年辽上京城市格局初步形成,辽上京呈现出强烈的东向格局特征,其城郭、建筑与道路多东向,并形成以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及宫城内宫室建筑为关键点的东向轴线。随着契丹政权形式与性质上的中原化,在上述东向格局的基础之上,辽上京的城市形态呈现出诸多新的变化,以特征性建筑上的方位表达为代表,南向格局形制的大量出现,呈现出对既有东向格局的突破与消解。因此,辽上京的城市格局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坐西朝东”还是“坐南朝北”的问题,其格局的历时性动态变化,不单单在空间表达上使辽上京的空间安排呈现出某种复杂性,更以上述过程作为表征,反映出辽人在上述时空环境下的方位观念之变化。

辽初上京东向格局的形成,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契丹政权在权力表达的过程中,试图对不同族群进行整合时所产生的冲突现象。根据相关记载来看,“劫掠-安置”模式并不能使劫掠而得的定居人口在契丹部族的政权结构中得到有效之整合,因此双向性统治宣誓手段的出现便成为此时契丹政权在权力运作当中的突出特点。从此时辽上京的实际格局来看,营建城郭宫室是出于向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定居者表达权威的需要;而屋门东向,则应和了向漠北游牧部族展示权威的需求。因此,辽上京早期的东向型城市形态并非仅仅是契丹民族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外在表达,而是上述话语、权威的根本性冲突下的一种“妥协式的平衡”。

辽中期上京格局的新变化,意味着辽政权体系内上述平衡性的破坏与冲突的加剧。“妥协式的平衡”剥夺了任何一种“文明话语”在政权中的垄断可能,而渤海、燕云十六州等带有浓厚中原文明色彩地区的纳入,造成了权威表达的严重失衡,辽政权被迫以更加偏向中原文化的话语进行权力的表达。从此时辽上京实际格局出现的新变化来看,“汉制”、“礼仪”等中原文明语境下的概念成为新建筑营建的重要参考因素,平衡下的混合式城市格局以“多元形态”的面貌呈现出实质性的消解。其在政治维度上的表现便是混合式政治体制的消解与双轨制政治体制的成熟:“四时捺钵”与“五京制”、“北面官”与“南面官”<sup>③</sup>,其核心便是冲突下所形成的另一种“动态平衡”。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便是“权力”同“城市”的关系,权力因素常常伴随着城市的规划、建设、发展、衰落与废弃,在城市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夯土城墙、宫殿基址与周遭的高规格墓葬,均是自新石器时代始城市遗迹中的重要元素。春秋战国以来,文献中可考的礼仪性建筑、礼制性布局与礼俗性活动勾勒出以权力为核心的城市生

① 《辽史》卷37《地理志一》引《薛映记》,第500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年第1期;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内蒙古辽上京遗址探微》,《中国文化报》2013年6月7日,第4版。等。

③ 参见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尤李:《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傅林祥:《辽朝州县制度新探》,《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宋金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

态的巨大图景：权力网络下的礼仪、社会交往与社会行为；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空间互动、空间认知与空间安排；建筑、个体同政治的内在关联性——这样的图景究竟以何种形式展开？其互动又以何种形式发生与完成？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实例性研究以补全这张宏大的拼图。

因此，在考证辽上京城市形态变化的基础之上，我们希望上述考察能够对探索由城市形态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城市同权力因素间的关联起到一定的帮助。

〔作者马郝楠，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香港 999077〕